

取向的融合與互補，大致可以觀察到三種歷史觀的融合，即國際化的視角、長程的歷史觀和內部取向的歷史觀。方著特別注重地緣政治的因素，對於盟國戰略選擇對中國在東亞戰場地位的影響有清醒的認識。同時，方注重內部取向的歷史觀，主張站在中國自身立場，從中國歷史延續性方面，從中國內在發

展的規定性方面，重新審視西方對中國的影響，觀察中西互動的複雜情形。在方法論上，方以中長時段的歷史考察為視角，提倡在更大的時空範圍內梳理歷史發展的脈絡，揭示了歷史事件的多元面相。筆者相信，方德萬的研究對我們研究抗日戰爭史乃至民國史都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學運「去政治化」為何失敗？

● 程映虹

中國二十世紀的校園政治是一條貫穿中國現當代歷史的重要線索。對於這一條重要線索，一般讀者比較熟悉的是正面的敘述。黃堅立的《難展的雙翼》試圖梳理學運這條線索的另一面，並對國共的成敗貢獻提出一些思考。



黃堅立：《難展的雙翼：中國國民黨面對學生運動的困境與決策：1927-1949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中國二十世紀的校園政治是一條貫穿中國現當代歷史的重要線索。在辛亥革命之後，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史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始於「學運」，終於「學潮」。

對於這一條重要線索，一般讀者比較熟悉，也是一般歷史教育比較重視的，是正面的敘述，即學生運動如何起源和發展，如何向威權提出挑戰，如何與其他社會運動相結合。當然，「正面敘述」的內容也包括學生如何受更成熟的政治勢力影響甚至操縱，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黨派鬥爭的工具，奉獻和犧牲換來的是為人作嫁。但這條線索的「反面敘述」則是一般讀者不太熟悉的。反面敘述的策略就是從威權政府的角度來考察學運的獨立政治傾

向和社會影響，以及威權政府如何將學運吸收到政治大動蕩之後的新體制確立和社會經濟發展之中，最終消解學運作為重要的政治力量對政權構成的威脅。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黃堅立教授最近在中國出版了《難展的雙翼：中國國民黨面對學生運動的困境與決策：1927-1949年》(以下簡稱黃著，引用只註頁碼)一書。此書是黃堅立的博士論文，1990年代就出版過英文版(*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Guomindang Policy towards Student Political Activism, 1927-1949* [Bern; New York: P. Lang, 1996])。黃堅立試圖在書中梳理學運這條線索的另一面，並從這個角度對國共的成敗貢獻提出一些思考。在今天回顧辛亥革命以來百年中國現代化的過程時，黃著對於華文讀者來說是很有意義的。

在中國大陸的一般歷史教育中，學生的政治活動或者政治參與似乎一直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聯繫在一起。前者不但為後者準備了幹部和組織資源，提供了群眾動員的工具，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們之間的關係成為中共革命合法性理論的一部分，因為這個理論強調具有理想主義情懷和獻身精神的青年學生是在共產黨那裏，而不是在國民黨那裏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最近一些年來，有很多當年從學生運動投身革命的老一輩共產黨人，不但對1949年以來的歷史，而且對1921年以來的歷史有了很多新的思考。他們突破了革命話語的束縛，引進了

自由主義學理和普世價值觀念；也有從民族國家建構的角度，對民國時期的政治有了新的評價。但在對當年學生運動的敘述上，絕大多數新作品還沒有出現與此相應的變化。一些人對自己青年時期參加學運的回憶仍然是浪漫情懷有餘，歷史反思不足。

黃著強調，作為共產黨的政治對手，國民黨的歷史，尤其是在1920年代國共合作的時期，也是和學生的政治參與密切聯繫的。國民黨的軍校以及各種青年和婦女組織都吸收了大量的學生，各地各級學生聯合會也密切配合了國民黨的政治和軍事行動。各地學聯和國民黨左派的關係尤為密切。國民黨北伐成功和基本統一中國，是和學生運動的支持分不開的。至少在當時，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代表了中國的希望，受到了部分青年學生的全力支持。

大革命時期的學生運動，和工運、農運以及婦運一起支持了國民革命的發展，形成了強大的歷史慣性。這個群眾運動的歷史慣性在1927年國民黨「清黨」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裏，仍然對國民黨政治發揮着影響，並沒有因為統一戰線中極左翼被鎮壓而一夜間消失。這也是今天的讀者不太注意或了解的。黃著指出，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初，國民黨高層無論是左派、蔣介石集團甚或是右翼西山會議派，都「順應了當時的政治現實」，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和鼓勵各級學運，這是清黨前政策的延續」(頁35)。國民黨南京中委會在「四·一二」事變後沒有

最近一些年來，有很多當年從學生運動投身革命的老一輩共產黨人對1921年以來的歷史有了很多新的思考。但在對當年學生運動的敘述上，絕大多數新作品還沒有出現與此相應的變化。

黃著指出，黨化宣傳的目的並不在鼓動和激勵學生參加政治活動，而是要馴化學生，讓他們接受國民黨政權統治中國的現實，遠離政治，一心學習。這一「禁」一「倡」，硬軟兩手，就是國民黨對付學生運動的「雙翼」。

對學運採取系統的限制政策；武漢中委會在「七·一五」事變參與「清黨」後只是從組織上清理被懷疑是共產黨員的學聯領導人，對學聯本身還是從財政上給予支持（頁31-32）。

黃著指出，國民黨對學運政策的重大變化開始於1928年春。隨着國民黨威權政府的確立，建設民族國家、實現政治穩定，逐漸成為國民黨高層比較一致的共識，為此必須放棄大革命時期疾風暴雨的群眾運動的方式。這個共識也是出於對共產黨在基層群眾運動的動員和組織上仍然有相當影響的擔心，生怕它利用群眾運動來挖自己牆角。在這個轉變中，戴季陶和蔡元培起了很關鍵的作用，黃著稱之為「戴季陶—蔡元培政策路線」（頁54-55、81、217-18）。

作為國民黨的主要理論家，戴季陶認為中國要解決當時面對的難題，先決條件是必須要擁有一個安定和平的政局，而整個教育體系更應如此。1927年12月，戴把他擔任廣州中山大學校長時的一系列講演結集成書，題為《青年之路》，該書前言提醒青年專心向學，求學期間不宜參與政治，否則不僅浪費寶貴的學習時光，而且會為養成青年人魯莽的個性埋下禍根。他提出三項建議：(1) 政治家決不以青年為工具，特別是以推動青年運動為託詞；(2) 理應採取所謂「保育」政策，竭力避免讓青年耽溺於政治鬥爭之中；(3) 必須保證教育體制的穩定及改進，同時必須發展科學和實業。戴尤其強調必須立即禁止中小學生參加政治組織和活動。對於成

年大學生，他建議可以允許入黨，但必須是以個人而非學校或組織的名義（頁41-42）。

五四時期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曾提倡「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蔡元培，時任國民政府大學院（後來的教育部）院長，和戴季陶一起提倡教育的非政治化和校園生活的正常化。1928年5月，他主持全國首屆教育大會，為國民政府制訂教育方案，基本以戴季陶起草的《維持教育救濟青年》方案為基礎，改大學學生聯合會為自治會，確定了禁止學生自治會干預國政校政的原則。作為妥協，學生個人還被允許參加政治活動，但必須接受學校的指導，不得擔任校外官職，不得罷課去參加政治活動（頁49-51）。

黃著指出，這條「戴—蔡政策路線」被國民黨接受並不順利。以中央黨部民眾訓練委員會為核心的國民黨左派不願意放棄大革命時期的大眾動員模式，在1928年民眾和學生抗議日軍阻撓中國統一的「濟南事件」後，一度重新強調學生運動的重要性，並和蔡元培等人在8月的國民黨五中全會上發生激烈爭論。但到1930年，國民黨中央訓練部最後確定對學生聯合會政策進行複審，出台了一整套有關學生自治會的政策，基本上採取了「戴—蔡」的主張，黃著稱之為學運「去政治化」的路線（頁81-93）。

學運「去政治化」的目的是將青年學生從政治鬥爭的積極參與者轉變為新政權下知識和技能的學習者，其主要實行方法是頒布一整套法規，將學生聯合會轉變為學生自

治會，解除或禁止這個組織的政治功能。同時，威權政府還在校園推行黨化教育，灌輸國民黨的政治思想和價值觀，以孫中山的遺訓和國民黨中央的政策文件為基礎，後來又在學校發展三民主義青年團（三青團）組織。黃著指出，這種黨化宣傳的目的並不在鼓動和激勵學生參加政治活動，而是相反，要馴化學生，讓他們接受國民黨政權統治中國的現實，遠離政治，一心學習。這一「禁」一「倡」，硬軟兩手，就是國民黨對付學生運動的「雙翼」（頁82-108）。

後人都知道，「雙翼政策」並沒有奏效。學生運動在1930至40年代都是中共領導的反國民黨政治鬥爭的一條重要戰線。為甚麼呢？黃著分析，其原因首先在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和步驟不斷刺激學生愛國主義的情緒，而在民族主義的強道德壓力和輿論支持下，國民政府始終無法將校園政治和社會上的民族主義運動用國家權力硬相分離，因此學校中明的和暗的學生組織，以及合法和非法的政治活動始終無法截然區分。1930年，國民政府全面制訂並推行「去政治化」政策不到兩年，全國學生就發起了抗議「九·一八」日本侵佔東三省的愛國運動；兩年後，「一·二八」運動的規模甚至更大。這些學生運動不但宣告了官方政策的破產，而且政府本身還成為抗議的對象。1937至1945年由於政府主導抗戰，所以基本沒有發生學運，但抗戰一結束，學運就在國共爭鬥的背景下捲土重來。

第二個原因是國民黨始終沒有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能主義政體，不可能在校園全力貫徹這個官方政策，有效地控制青年一代。例如，抗戰初期為了實現「全民抗戰」，國民政府不得不默認或允許很多獨立於官方的學生政治組織的存在。在灌輸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方面，從1920年代末開始，國民黨在高等和中等學校中開設了「黨義」課程，但因其形式生硬，內容枯燥而不受學生歡迎。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高層沒有利用政治權力強化灌輸，反而自亂陣腳。

1931年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們批評「黨義」課程，說它「不僅收效甚微，而且給多數學生一個錯覺，讓他們覺得『三民主義』是空洞乏味，毫無意義的」（頁98）。何況，這門課也缺乏符合條件的師資。因此從教育的觀點來看，這不應該是一門課程，它的內容應該被分散到社會和人文的各門課程中去，於是國民黨領導人決定用「公民課」取代「黨義課」。雖然國民黨意識形態的一些內容確實被「分散」到很多課程中去，但在思想灌輸上仍然沒有效果，這是因為這些課程的內容本來已經很重。總之，從1927至1949年，國民黨始終沒有實現「將其思想與政策灌輸給新一代，以統一政治觀點的目標」（頁99）。

在組織上，國民黨掌權後遲至1938年才成立一個針對青年的組織，即三青團。對這個組織，中國大陸一般讀者常常會認為它和國民黨的關係就像共產黨和共青團，是一種

「雙翼政策」並沒有奏效，其原因首先在於日本侵華政策不斷刺激學生愛國主義的情緒，國民政府始終無法將校園政治和社會上的民族主義運動用國家權力硬相分離，學校中明的和暗的學生組織，以及合法和非法的政治活動始終無法截然區分。

國民黨的「去政治化」政策不但未能限制學生參加政治活動，反而將這種消極的限制和共產黨統一戰線的積極策略形成鮮明對比，「反將學生中的活躍份子推向共產黨一方，使反國民黨的力量如虎添翼」，導致自己的失敗。

領導、服從和配合的關係。其實這是誤解。三青團成立的初衷是為了改造業已顯出暮氣和腐敗並充滿派系鬥爭的國民黨，所以在一開始就有黨團的權力鬥爭，直到1948年「團」被「黨」合併。黃著指出，三青團一開始和國民黨在權力機構爭奪成員（當時三青團成員的年齡上限是三十八歲），直到1940年以後才真正將重點轉到學生身上。但統計數字顯示，學校中三青團的骨幹份子其實不是學生而是「先生」，是那些成年的學校官員。1943年出席三青團首屆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中大概只有百分之八的學生代表，在學校擔任團幹部的學生可能很難超過學校團幹部總數的百分之六（頁168-69）。這就是說，三青團的組織雖然針對學生，但團幹部的大門對學生開得很小。究其原因，可能還是和國民黨總體上不願意讓青年學生過多地捲入政治活動的考量有關。

黃著的結論是國民黨的「去政治化」政策不但未能限制學生參加政治活動，反而將這種消極的限制和共產黨統一戰線的積極策略形成鮮明對比，「反將學生中的活躍份子推向共產黨一方，使反國民黨的力量如虎添翼」，導致自己的失敗（頁241）。

黃著討論的是學生與國家、教育與政治之間的關係，這些是和中國現代化過程有關的大問題。讀完全書，筆者有這樣兩點感想：

第一，學生政治家或學生革命家可能起源於十九世紀下半期的俄國，以俄國民粹黨人和更激進的以

暴力反沙皇專制主義者為代表，後來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中很多都是職業政治學生，列寧和斯大林都是這個出身。職業政治學生的出現，固然是對社會矛盾和問題的抗議，但也是對現代化過程中社會精英必須走科層化路線——即通過知識和經驗的長期積累，並在官僚或學術機構中長期浸潤和磨練——的反抗。在這個意義上，學生政治家或革命家這條道路對於具有政治抱負的青年來說，是一條參與社會政治活動和分享政治權力的捷徑。

二十世紀很多激進主義革命的共同特點，是它們都是由求學時代就投身政治的人領導和參與的。而現代化的國家和非現代化的國家相比，其區別之一就在於科層結構吸收和造就政治精英的能力的強弱，由此產生社會是穩定還是動蕩的不同後果。民國時期的中國顯然屬於後者，而國家內外的危機，更為學生政治家的大量產生準備了肥沃土壤。國民政府之所以失敗，從這個角度來看是由於它處在這樣一個尷尬的歷史時期：國民政府承襲了學生運動的歷史負擔，企圖將它消化到國家建設的過程中，但卻不能提供那些還沉浸在學生政治家或革命家的理想和熱情中的青年一條參與政治的捷徑，從而將他們推到了自己的政治對手那邊。

第二，今天一般都認為1949年以後中國政治的特點之一是群眾運動上升到國家政治的層面。黃著對學生運動的考察提醒我們，其實這個特點可能在1920年代的大革命中

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而且對從1927至1949年的中國政治有相當的影響。

1920年代中期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打破了分工和階級的差別，把所有社會階層(尤其是學生)都捲入政治鬥爭之中。國民政府掌權後想建立現代國家各司其職和常規化的制度，擺脫和最終廢除大眾動員的模式。但群眾運動的歷史慣性仍然非常強大，外部民族主義的壓力又為這種全民動員的模式提供了合法性。具體到對學生和青年的態度，

國家政權想讓他們安於校園生活，遠離政治，完成學業和人格培養，但這個願望不但在現實中無法實現，反而在強大的歷史慣性和政治對手繼承和強化這個慣性的政策面前束縛了自己的手腳。良好的願望反而成為了弱點。

回顧這段歷史，超越由於國共紛爭帶來的黨派偏見，今天看來，可能還是戴季陶和蔡元培對於學生與國家、教育與政治之間正常關係的理解比較符合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吧？

行政權力和生態災害

● 王東亮



馬俊亞：《被犧牲的「局部」：淮北社會生態變遷研究(1680-1949)》(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傳統中國有「縣權不下鄉」之說，最近的史學研究也證明了這種說法確實存在。中國東南強大的宗族組織和江南的紳士團體都能對國家的行政力量起到制約作用。但與東南和江南相比，淮北地區則是典型的「縣權下鄉」之地，國家行政權

馬俊亞以「行政權力統治社會」為核心理論，深入分析淮北地區社會生態惡劣和暴力崇拜的根本原因，認為淮北地區衰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最高決策者為了顧全「大局」，將淮北作為「局部利益」犧牲了數百年。